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易希林¹, 张俊杰², 张淇¹

1.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11

摘 要： 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技术革命所构成的生产力飞跃，构筑了这一理论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为其提供了适应的社会背景，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益凸显则作为该理论成立的现实依据。这些因素相互交织融合，汇聚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特有的历史合力，为其生产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前提条件，共同推动了这一理论的诞生。

关 键 词：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形成条件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Yi Xilin¹, Zhang Junjie², Zhang Qi¹

1.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2. College of Marxism Swan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211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The leap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d by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ormed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is theory, the profound chang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vid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it to adapt, and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served as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theory. These factors interwoven and fused, converging into the unique historical force of Marx and Engels era, laid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his theory of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and jointly promoted the birth of this theory.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production; formation condition

任何思想体系均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 这表明，科学探索需超越刻板观念，深入探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结合历史背景，考察社会演变及其矛盾。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回溯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剖析其经济基础，并重构当时社会的整体风貌。因此，深入研究该理论需剖析其历史土壤与物质基础，重构其萌芽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一、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飞跃和社会结构变革，为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提供了历史条件。技术飞跃具体体现为工厂取代传统工场、机器取代手工劳动。马克思强调，“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力来推动”^[2]。由此可见，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作机的创新，深化表现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机器制造工业的崛起和“机械生产机械”的实现标志了工业革命的圆满落幕。蒸汽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问世推动了工业领域的全面机械化进程。

机械化进程在各个生产领域的加速推进，以及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激发了机器制造业实现技术革新的迫切需求。1794年间，一项重大发明——转动式模型刀架，由亨利·莫兹利所创，标志着机器制造业领域再一次取得了重大进展。转动刀架能够大幅提升机器部件加工的效率与精度，其“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2]。随着转动式模型刀架的问世，一系列新型机床如车床、铣床、刨床及磨床等陆续涌现，进而促进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进程。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圆满达成以机械生产机械的目标，此壮举象征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终结。

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生产力。1847年，马克思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CX202404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易希林（1996—），男，汉族，湖南怀化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俊杰（1998—），女，汉族，山西大同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淇（2000—），男，汉族，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还要多。”^[1]这一时期，人类广泛应用机器、化学原理，轮船航行、铁路铺设、电报传递，广阔大陆被开垦，河流通航，人口激增。19世纪前半叶，西方社会的生产力显著进步，主要体现在机械化生产、社会化生产和全球化生产趋势三方面。

就机械化生产而言，至19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蒸汽机驱动的大机器替代手工劳作，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机器大工业的新纪元。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关键经济部门实现机械化生产，成为“世界工厂”。^[2]法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德国于19世纪30至40年代开启工业革命，柏林成为机械制造核心，萨克森与西里西亚崛起为纺织业中心；美国则在农业领域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发明并应用各类农业机械以应对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从社会化生产的角度审视，至19世纪40年代，众多西方国家中，工厂生产模式已广泛取代了小作坊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工厂内部，生产资料实现了集中管理，供大量工人共同使用，取代了以往生产资料分散于个人手中的状况，成百上千的工人基于分工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围绕着机器集中作业，各自负责不同工序，并共同生产出同一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使得任何单一工人都无法宣称“这是我独立完成的作品，这是我的产品”。^[3]

从全球化的生产视角出发，交通运输业的进步为生产全球化的兴起与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已广泛取自通商贸易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场所，其工业产品也不再局限于满足本国市场需求，而是广泛销售至全球各地。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以往那种局限于地方与民族范围的自给自足及闭关锁国状态，已被各民族间在各个层面上的广泛交流与相互依赖所取代。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的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的范畴。^[4]由此，工业革命的浪潮同样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定型。

生产规模的扩大化，作为生产机械化和全球化的直接成果，彰显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生产、精细分工及国际贸易的推动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机器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流程的紧密衔接，进而实现了生产规模的大幅扩张。与此同时，精细分工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增强了生产能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外资源的引进与世界市场的需求，成为推动生产规模扩大的关键因素。以铁和煤的生产为例，1790年至1850年间，英、美、法、德等国的煤、铁产量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充分展示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强劲动力。生产力的技术革命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更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应用，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变革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进而得以科学地揭示新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及其发展规律。

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

工业革命不仅标志着技术层面的巨大革新，更是引发了深远的社会转型。由蒸汽机技术所驱动的机械化工业革命，深刻地触动了市场拓展、城乡布局乃至社会结构的变革，从而为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首先，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量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生活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机器在制造、建设、烘焙和缝制等领域的应用，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辅助，生活节奏加快。工业与农业分离，劳动分工明确，催生消费革命。商品流通加快，民众对市场依赖增强，消费需求和模式深刻变化。劳动力还从农业转向工业，甚至跨国流动，拓宽视野，改变思维方式，推动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强调个人才能和自由竞争，催生利己主义观念。

其次，工业革命深刻重塑了全球商业贸易格局，强化了经济联系，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起源于大西洋北部英国的技术革新，突破了地理界限，扩展至美洲、亚洲，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融合。工业革命期间，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方式及其理念广泛传播，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加强了全球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工业革命推动国家间分工细化，各国依照自身优势广泛参与分工，构建起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人口与资金流通的国际化则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英国正是凭借其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率先开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掌控。

最后，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厂制度，进而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间的新型劳动关系。在此关系中，劳动者向工厂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薪资，使得劳动力商品化，劳动者所创造的超出所得薪资的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导致了两者事实上的对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

除此之外，工业革命还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资本家作为工业革命的资本提供者及组织者，其唯一追求在于利润最大化，他们视财富积累为唯一幸福，将金钱损失视为唯一痛苦。^[5]随着资本家对利润的不断追求及生产的持续扩张，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最终引发经济危机，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为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社会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迫切的客观需求与现实依据。^[6]

三、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充分暴露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化特征。而另一方面，那些本该由广大工人群众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以及他们携手创造的产品，却被资本家个人无偿占有。这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的分离，构成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造就了两类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7]

这一根本冲突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尤为明显。从阶级关系的视

角来看，它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根本对立上。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在生产生活层面，这一矛盾则具象为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之间的强烈反差。当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必然爆发，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加剧各方矛盾冲突。^[6] 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就会像幽灵一般，周期性地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空，成为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隐患。

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首次面临经济危机的挑战，其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在拿破仑战争之前，英国凭机械制品优势主导全球市场。然而，1815年后，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兴起，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当时英国的工业产量占据全球半数，但市场拓展屡屡受限，加之工人工资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失衡爆发了首次经济危机，导致英国生产下滑，金融股市下跌，银行、企业破产，纺织、机械、建筑等行业遭受重创。而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837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冲击，源头直指美国杰克逊政府的法令。19世纪30年代，英国铁路建设加速工业增长，带动商品需求的激增，从而刺激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与投机热潮。在此背景下，美国成为英国资本输出的重要目标，但

英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导致美国本土市场的供需失衡，导致生产过剩出现，商品价格下跌，企业与投资者陷入困境。1836年，美国为打击土地投机行为，颁布严令，引发了连锁反应，加剧经济困境。危机由此迅速蔓延至远在大洋彼岸却又联系紧密的英国，导致其对美出口锐减三分之二，商品积压，银行债务危机加剧，企业破产风险上升。^[9] 此次危机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同时也展示了经济危机传播的国际性。

184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第三次经济危机的洗礼，而这次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英国粮食市场的投机活动。19世纪40年代，欧美工业革命深化，英国工业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此时，铁路建设热潮带动钢铁业扩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10] 然而，受限于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和劳动人民购买力有限的双重阻碍，1845—1846年间，英国商品出口出现下滑，欧洲多地遭遇歉收，致使粮食市场的投机性进一步加剧。1847年，英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主要工业部门，超过6000家企业倒闭，社会失业率飙升。此次危机，相较于前两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三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固有限制，促使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内在冲突及其未来趋势。基于这一认知，他们断言社会主义体制终将取代资本主义，明确指出了改革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王治东，罗海旗. 马克思生产工具理论的三重逻辑架构[J]. 哲学分析，2023，14（01）：61-74+197.
- [6] 王传利. 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07）：56-66+160.
- [7] 高泽华. 经济学说史视阈下的生产社会化：本源与发展[J]. 当代经济研究，2018，（04）：54-62.
- [8] 高泽华. 生产社会化理论的本源与分析框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总结和阐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8（06）：9-38.
- [9] 辛向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初探[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1）：79-85+160.
- [10] 邱海平. 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2002，（07）：13-17+73.